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经济学（第一辑）

Die Entwicklung der theoretisch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im ersten
Viertel des 20 Jahrhunderts

二十世纪的经济学说

[匈] 温格尔 (Theo Suranyi-Unger) 著 宋家修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 经济学（第一辑）

Die Entwicklung der theoretisch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im ersten
Viertel des 20 Jahrhunderts

二十世纪的经济学说

〔匈〕温格尔（Theo Suranyi-Unger）著 宋家修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的经济学说/(匈)温格尔著;宋家修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经济学)

ISBN 978-7-5520-1152-4

I. ①二… II. ①温…②宋… III. ①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5506号

二十世纪的经济学说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23.5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152-4/F.347

定价: 110.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人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要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续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

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匈〕溫格爾（Theo Suranyi-Unger）著 宋家修 譯

二十世紀的經濟學說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塞利格曼序

本書原本最初引起我注意時，有三點使我非常的驚異。

第一點是著者的驚人的博學。溫格爾博士係匈牙利人，像其同國人所常見不鮮的一樣，精通數國的語言。德文、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沒一種他不是內行，其它他所習用的語言更不必說了。就我所知而論，現在活着的經濟學家，再沒有第二個能夠像他這樣勝任愉快的處理着世界的文獻。況且溫格爾博士是受過良好的學校教育的，對於所關各種學科，又都修養有素。

第二點是溫格爾博士對於經濟科學之哲學的方面，興趣最濃，也許是因他曾經求學於德國各大學的原故。這由他幾種初期著作專討論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一點，便可以證明。最近幾年他所發表的許多文章，固然表示他毫未疏忽日常的實際問題；但是溫格爾博士對於經濟學論爭之哲學的探討，總有着一種偏愛，和有些經濟科學的創立者同其嗜好。這在德國經濟學家中，本也算不得什麼，但在其它諸國晚近著作裏究屬少見。所以本書必因他這出發點的異乎尋常，而格外博得歐、美讀者的歡迎。

第三點是，以一個超越主要種族和語言畛域的人，把經濟學文獻下一番深刻的研究，我認為本書要算是破

題兒第一次。故此溫格爾博士對於德、法、意、英、美諸學者間，能够毫無偏執，將五大國經濟學著作中的貢獻作一個全般的概觀，不但非常忠實，亦且已近於可合理期望的平允。本書對晚近美國文獻，尤多注意，所以它在大西洋此岸，定能引起特別的興趣。還有，本書德文版出版之後，著者曾旅居美國幾年，因此關於美國文獻的部分，又多所增訂。

爲了這許多點，同時又爲了我個人對著者的傾佩，使我贊同把它逐譯出來，並樂爲纂訂。依我看來，本書可以彌補我們經濟學文獻中一個不可否認的缺陷，不僅僅大學生應該歡迎它，就是普通人，只要關心經濟思潮之國際的發展的話，都大有一讀之必要。

Edwin R. A. 塞利格曼

一九三一年六月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著者英譯版序

書中用小字所印諸節，特爲想知道得更詳盡些而尤其是對於這題目的傳記的方面有興趣的人們預備的，對

於本世紀以來理論經濟學的發展只想得一個概觀的人，可以略去不說。

寫學說史本來有三個方法。第一個是純粹記述的方法，僅依時間的順序處理着過去各派學說。第二個是批判的方法，著者對別人的意見加以「批評」，表示只有自己的思想是絕對正確的；因之把一個有意歪曲的，片面的科學發展形象給與那毫無疑心的讀者。第三個是發生的方法，這是最好的一個方法：從它們本身的發展，更從它們相互間的深奧的關係，去闡明各派意見。本書之作，便想奉這發生方法之原則做規臬。

然而，終因缺乏一種必需的歷史配景(historical perspective)之故，現代經濟學說發展史裏面的事件，可以訴諸純粹發生的方式來研究的，畢竟太少了。這一種缺乏，在本書中簡直像一個永遠的疵點，尤其弄得我們不好到底選擇那些學說來討論。整個發生的表現法之批判手段，盡在下面這辦法之中：即，這部學說史概觀的材料之搜集，只能以我們對於成爲問題的各派學說之評價即照它們內含的根本重要性的評價爲決定取舍之準繩。如果有人從他自己的觀點，責我對於不緊要的事情，偏很注意，而對於更重大的反忽略了，那他是對的。不過希望他記取一個著名的事實：高慎(Gossen)是仰仗考夫(Kautz)纔第一次得以和他的「發現者」哲封斯(Jevons)

見面的。考茨的書出版於一八六〇年，當時大多數最著名的經濟學者不都以為說及高慎這樣的小作家，是完全不必的嗎？然而要是考茨沒有注意高慎的見解，那他纔真個大錯了。這類事情在我們今日，尤其容易發生；今日經濟學的發展，一切的情形都更來得變幻莫測。

為要盡我力之所及避免這點起見，我企圖在本書三大篇中（準照三大言語區域論述經濟科學最近發展）儘量刪繁就簡的介紹多數新思想。我想大部分從定期刊物中去搜求，這類刊物一般為人所忽視，而且對於許多學者，根本就不易到手。定期刊物裏面毫不誇張的文章，其實倒常包含着非常重要的新發現。不用說，我並不想在本書中作一個完完全全的概觀。為着缺乏一種歷史的配景，常逼我不得不採用圖書提要的筆調。來描寫這三大篇。我努力保持我嚴格的客觀，因為竊以為與其在「獨斷批評」的形態上把材料給與讀者，而附以己見；毋寧徵引各種理論的討論，而用訓練有素的科學批評接受新學說，或者於讀者更多裨益。務使讀者讀了本書，能夠得到現代大多數的意見，而不局限於我一人的觀點。我望這個加重的客觀態度，可以由第一章尤其是最後的總括之更自由更主觀的調子，而得到平衡。不過我還有向讀者聲明一下的責任；即，總括中關於經濟學說之現狀，甚或將來的發展所表示的意見，僅只包含着我自己主觀的見解而已。

在這一卷中把我自己三方面加以限制，我想是必需的：即內容方面，時間方面，和語言方面。務求其不踰越我所有的文獻的材料。第一就內容講，我把我自己制限於所謂純粹理論經濟學的發展，三大篇裏皆循着這一個

固定的計畫而進行。正唯其有了這一個嚴格的統一，本書就言語區域分編這事體，纔似乎是可容許的。只有把材料照這個格式排列着，纔使我們能夠論列各個言語區域內科學發展之特殊性。在這外部的構造裏，小小的重複是無可避免的，這種重複的發生，主要是由於將方法論的發展，另外提出來處理所致；但只有照這樣處理，纔不致埋沒了方法論的重要。雖然，爲了儘可能減少重複起見，所以一個學說既經說及，別處便不再多贅。如果三大篇中提及的學說而未指明其出處，那一定是出於該著者前面已經指出的書中。關於貨幣理論，我爲兩個理由把它略去了：第一，就目前情形說，貨幣論大多數場合沒有形式經濟理論的一個統一的有機的部分。我們只須拿幾個有名的經濟學家的貨幣論比較一下，就知道它們和整個經濟理論其餘部分，常只有一種鬆散的關聯吧了。派別不同的幾個經濟學家，常見持着同一的貨幣論，而種種不同的貨幣論，也常可發現於同一派的經濟學家中。所以這種理論的討論，殊足擾亂本書的統一。再一方面，貨幣論在經濟學中這個比較特殊的地位，過去幾年已引起了許多可注意的研究，處理着它的最近發展。這些著作的完備，是使我略去貨幣理論的第二個理由。我對於生產論問題，以及和它最有關係的組織理論，也抱同樣的態度。加以我認爲，倘使不觸及最重要的經濟政策問題，是不能好好的談這些，信用和商業循環諸問題，是更加談不上。在我看來，與其膚淺的涉及經濟科學一切複雜問題，倒不如把自己制限於一個較狹隘的領域之爲愈。然而我仍盼研究者鄭重注意一事：大戰以來經濟研究上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轉變，人們對於組織理論的問題，漸多注重了。關於這項目的著作，定能給他以豐富的知識。

至於時間方面，我是維持着本書標題所示之限制。爲了這英譯，曾將德文版加以修訂，想把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這幾年的最近發展，包括進去。我已努力在書中幾個不同的地方表示出，我之選定本世紀轉換期爲全書時間的起點，並非完全偶然，在這一時期，經濟學上實有許多劃時的變化。但是屬於前世紀的各種理論和理論的概念，我只得根本不加說明。因此，諸位讀者若願追隨於我，就得對邊際效用這類舊概念，歸與論（Zurechnungstheorie, theory of imputation）古典的分配論等，完全了然於心。我勸初學諸君在讀本書以前，最好先研究一二種經濟學史的書。爲了這目的，最適當的恐怕要推匈牙利人赫勒（Wolfgang Heller）的小著了。它如史盤（Ohmar Spann）、蒙柏爾特（Paul Mombert）、季德和里士（Gide and Rist）、鮑葵（Bouquet）、亨納（Haney）諸人的書，都是值得推獎的。更求深究的人，則可在蘇順泰（Joseph Schumpeter）、蘇林（Edgar Salin）、史托兒（Rudolf Stolzmann）、赫蘭德（Sven Helander）、韓內革（Hans Honegger）、包克（O. F. red Boucke）或荷曼（Paul T. Homann）的學說史書裏，找到貴重的幫助。拙著經濟學中的哲學（Philosophie in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2 Bde, Jena 1923—26）也可以作爲一部準備書。對於能夠得到這部書的人，我特別推薦他選讀下述諸章：“Die Physiokraten”（I. P. 284 ff.），“Die klassische Schule der Nationalökonomie”（I. P. 372 ff.），“Die historische Schule und die Neoromantik”（II. S. 141 ff.），“Die Nationale Gedanke”（II. P. 203 ff.），“Die exakt Vergleichende und die mathematische Richtung”

”(II. P. 281 ff.), “Die Mengerechen positiven Wirtschaftstheorien und die Österreichische Schule” (II. P. 356 ff.) “Marxens volkswirtschaftliche Lehren” (II. P. 515 ff.) “Die Stellung des Marxismus in der neueren Entwicklung der sozialistischen Lehren” (II. P. 524 ff.)

最後第三方面，我僅僅處理着用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所寫的著作。這幾國文字的著作，已將現代經濟科學發展的大多數重要貢獻包括殆盡了。西班牙文和許多斯拉夫文的文獻，我本也能夠處理的，不過萬一處理了，那就會和處理我本國（匈牙利）的文獻一般不妥當，因為，爲了我的語言學的關係，對於比這些更重要得多的斯塔的納維亞諸國以及荷蘭的經濟學說皆未能處理。關於這些國度裏的理論著作，我只把它們已譯成上述四種文字的加以考察。其有數種文字翻譯者，則僅在最先譯出之語言區域，關聯着述及。

我很明白，這一卷只是一個不完全的企圖而已，我對於這項工作上的許多大難關，僅僅克服了很少的一部分。倘若後之經濟學史家，能夠利用我這書作爲二十世紀第一季的參考，我的目的就已達到了。我在各種語言區域的經濟學說之間的鴻溝上所做架設橋梁的工作，或者還算得有一點點的成功。關於經濟科學之國際的認識，最難得是大家分工合作。我對於德國、諾曼、盎格魯薩克遜科學精神之顯著的對照所要說的話，全是自由的，客觀態度的，因爲我自己所屬的文化環境，與它們都不相同，它們對於我的影響幾乎是一樣多的。

最後我得表白一個快樂的義務，凡新舊世界我的一切同事，對於本書的準備曾予以幫助的，我都在此謹致